

國際化視野下的太平天國史

——評裴士鋒《天國之秋》

● 吳盛杰



裴士鋒 (Stephen R. Platt) 著，黃中憲譯：《天國之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國際化視野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已逐漸成為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新趨勢，最近出版的太平天國研究著作《天國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引用只註頁碼)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裴士鋒 (Stephen R. Platt) 是耶魯大學中國史博士，師從著名漢學家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作者運用中、英、美等多方面的檔案、日記、著作、論文等材料，為讀者全景式地展現了1860年前後太平天國運動後期所發生的各種錯綜複雜的事件。該書英文版甫一出版便獲得了2012年美國歷史學界獎金最高的坎迪爾大獎 (Cundill Prize) ①。

《天國之秋》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帝國的黃昏」，作者以清王朝的衰弱為背景，分別梳理了清廷、太平天國和西方列強 (特別是英國) 這三者之間的微妙關係。作者首先關注的是洪仁玕與傳教士的關係，認為這是太平天國與西方的天然紐帶之一；其次，李秀成帶領的太平軍經略江南，威脅上海，又與西方列強形成一種軍事對峙態勢。同時，英法兩國與清廷圍繞簽訂新條約的問題又發生了衝突，

國際化視野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已逐漸成為新趨勢，太平天國研究著作《天國之秋》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全書分別從太平天國、清廷和西方列強各自的角度去敘述，將整個太平天國的歷史放在十九世紀中期的世界史視域下進行思考。

在西方學界，太平天國運動一直被描述為一場「叛亂」。在中國大陸的革命史語境中，太平天國運動則長期被定位為「農民起義」。而「內戰」作為一個不帶感情色彩的詞彙，似乎沒有被任何一方接受。

1860年英法聯軍直接衝擊了清廷的權力核心，洗劫並摧毀了皇帝的宮廷之一圓明園。然而，這一南一北看似要完全推翻清王朝統治的態勢卻沒有變為現實，西方列強在做出一番權衡之後選擇了「中立」的立場。在第二部分「挽狂瀾於既倒」中，曾國藩成為敘事的主角。在嚴峻的形勢之下，他以一介文人的身份建立了湘軍，在多次與太平軍交戰失利後仍頑強地堅持下來。此後與太平軍的相持過程中，湘軍逐漸佔據上風，並取得了安慶爭奪戰的決定性勝利。而隨着國際形勢出現重大變化，特別是美國內戰的爆發，西方列強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也逐漸站到了清廷這一方。第三部分「太平」主要敘述了太平天國走向失敗的過程。曾國荃所領導的湘軍圍攻南京，李鴻章的淮軍收復了上海周圍的江南地區，而英國更直接出兵攻取了太平天國控制的港口城市寧波。在多方的壓力之下，南京被攻陷，太平天國運動以失敗告終。

太平天國史的研究曾是一門顯學，中西學界皆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問世^②，要在既有的研究框架下有所突破已不大可能。本書作者也深知這一點，所以他並沒有把本書設計成為一部太平天國全史，而是着眼於太平天國的後期，以太平天國的結局而非起因作為重點來分析（頁xix）。全書分別從太平天國（主要是洪仁玕）、清廷（主要是曾國藩）和西方列強（主要是英國）各自的角度去敘述，將整個太平天國的歷史放在十九世紀中期的世界史視域下進行思考，並提出了幾個饒富

深意的問題：首先，太平天國是「叛亂」還是「內戰」並不只是個歷史問題；其次，關於太平天國運動中「反滿」訴求的重要性；此外，太平天國到底是不是在中外勢力的聯合絞殺下失敗的；最後，太平天國的失敗對曾國藩和英國有甚麼意義和影響。本文將從這幾個方面進行論述並評介。

一 「叛亂」還是「內戰」？

太平天國運動到底應該被定位為「叛亂」(rebellion)還是「內戰」(civil war)，似乎只是關乎歷史研究者的立場問題。在西方學界，太平天國運動長久以來一直被描述為一場「叛亂」。就像當時的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Frederick Bruce)所說：「太平天國是不折不扣的一股無法無天的勢力，是所有文明有禮者或受到良好治理者的公敵。」(頁389)在這樣一種自認為是文明傳播者的道德語境中，英法等列強把自己打造成為中國社會秩序的守護者，義不容辭地幫助中國平定「叛亂」。郭廷以也認為，太平天國「究其本質，並無異於中國歷史上的一般叛亂」^③。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的革命史語境中，太平天國運動則長期被定位為「農民起義」，是農民階級反抗封建勢力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偉大革命^④。而「內戰」作為一個不帶感情色彩的詞彙，似乎沒有被任何一方接受。

然而在作者看來，判定這場運動是「叛亂」還是「內戰」，似乎不只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對太平天國

運動發展至關重要的因素。作者通過整理英國的外交檔案和議會的記錄，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觀點：正是由於英國在國際法層面上沒有認定當時中國國內的情況為「內戰」，沒有承認太平天國作為「交戰團體」的地位，才導致英國政府全面禁止武器、人員流入太平天國一方，從而使戰爭的天平倒向了清廷一邊（頁250-55）。

當然，英國政府做出這個決定絕非無的放矢，而是充分權衡利弊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即是1861年美國內戰的爆發。作者指出中國和美國是英國全球貿易的兩大市場，英國的經濟命脈——棉紡業直接依靠這兩個國家維持。美國內戰爆發導致棉花供應中斷，遂使英國棉紡織品的價格暴漲，其在中國的銷量自然一落千丈。此外，茶葉也是英國海外貿易的重要物資，而美國是茶葉的主要消費市場，隨着內戰爆發，這一需求也迅速減少（頁249）。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和美國的內戰使中美兩地同時出現戰亂，令英國的經濟面臨巨大威脅；要走出這個困境，最直接和最現實的方法便是開拓新市場——英國認為這個新市場就是中國內地，其中的關鍵即是1858年在《天津條約》中開放的幾個長江口岸。然而，長江中下游已然成為太平軍和湘軍最激烈的戰場，形勢混亂。隨着美國國內局勢的持續惡化，英國遂決定在中國採取行動。起初他們打算採取最直接的辦法，即與太平天國展開直接貿易（頁250），這就涉及到在國際法層面承認太平天國的問題。

當時英國政府已經認定美國的情況為「內戰」，承認了美國南方作為「交戰團體」的地位，這意味着南方邦聯可以向英國貸款及購買武器（頁251）。英國輿論普遍認為，政府也應該對太平天國採取同樣立場，但最終沒有實行。英國政府之所以承認美國國內的情況為「內戰」，就是想讓美國北南雙方的分裂成為事實，降低美國作為一個整體挑戰英國霸權的可能性。然而對於中國，英國政府有更多其他的考量：首先，中國對英國來說是個龐大的市場，這就要求這個地方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可是英國的政治家深深懷疑太平天國的治理能力（頁254）；其次，太平軍佔領了重要的港口寧波，雖然沒有禁止貿易，卻霸佔了所有關稅收入，而清廷用來支付英法戰爭賠款的最重要來源就是海關關稅（頁259）。

結果，英國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放棄了在國際法層面承認太平天國這一政策選項，與太平天國的直接通商因而不可能實現。既然此路不通，英國只能選擇與現政權合作，採取措施，盡快穩定局面，為通商創造良好的條件。大多數英國人深信：「保住清朝乃是確保英國對華貿易繼續成長，從而彌補他們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特別是美國）之嚴重損失的唯一方法。」（頁388）基於此，英國政府決定更加嚴格地執行所謂「中立」政策，其結果是徹底切斷了太平天國從西方獲取援助的各種途徑。

茅家琦曾說：「研究歷史事件，要將它放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考慮。就事論事的結果，往往是片面、偏

作者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觀點：由於英國在國際法層面上沒有認定當時中國國內的情況為「內戰」，沒有承認太平天國作為「交戰團體」的地位，才導致英國政府全面禁止武器、人員流入太平天國一方，從而使戰爭的天平倒向了清廷一邊。

頗。」^⑥本書完全體現了這一研究取向，經過作者對各種資料的整理、分析及多方聯繫，大洋彼岸的美國內戰和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看似毫無關聯，卻通過英國這個中介，彼此之間產生了各種紛繁複雜的相互影響。這不能不說是對太平天國研究視野的一次極大的拓展。

二 「種族革命」還是「文明衝突」?

由於太平天國所信奉的「拜上帝教」的教義來源於西方的基督教，所以往往被反對者貼上「顛覆中國文明」的標籤。最有代表性的即是曾國藩所作的〈討粵匪檄〉，他將太平天國運動稱為「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⑦，亦即把太平天國運動視為「文明衝突」。而本書作者則提出，理解太平天國運動最重要的角度是它的「反滿」訴求，認為太平天國運動作為一場「種族革命」的色彩更濃厚。

近年來北美漢學界的「新清史」研究已將傳統研究中對滿族政權的一些看法推翻。他們認為正是由於滿人對其民族特點的自持，有意識地通過各種途徑與漢族之間保持民族差異，才使清王朝的統治得以延續^⑧。從這些觀點出發即可認為，在清王朝統治時期，滿漢之間的矛盾從沒有真正得到解決，而南方人關於「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記憶也從未消散。《天國之秋》的作者通過太平軍後期的文宣材料和情勢分析，認為太平天國提出的「推翻異族統治」口號的效果遠勝於其宗

教意識形態的宣傳(頁xx)。共同的「反滿」訴求是理解太平軍總能在短期之內聚集數量眾多的軍隊的關鍵所在。

首先，作者重點從洪仁玕的角度敘述了太平天國運動中的「基督教」因素是如何脆弱。1855年之後，洪仁玕在香港長期擔任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的助理，直到他離港赴南京。期間他雖然結識了一批傳教士，但是這些人大多對西方特別是英國政府的決策沒有影響力。他信奉新教，寫出了〈資政新篇〉，描繪了將太平天國建設成現代基督教國家的宏偉藍圖，但要實現這一切，最基本的還是要從眼前的戰爭中取勝。加之他抵達南京之前，太平天國已是經歷了內亂的風雨飄搖的政權，原來拜上帝會的核心成員多已不在，那些後來加入的人多是因為貧困或是為了反抗滿清的壓迫。洪仁玕對這些情況有深入的了解，他在掌權後的第一個公告便宣稱「正宜遵中國，攘北狄，以洗兩百載之蒙羞」(頁64)。接着他改革太平天國的科舉制度，在考試中又重新加入了關於儒家典籍的內容。他還撰寫出版了一些宣傳小冊子，通過向太平軍投誠的清廷漢族官員之口，強調太平天國「是信守傳統的本土政權，繼承過去漢人抵抗外族征服的遺風」(頁174)。在與曾國藩爭奪民心的隱形戰爭中，洪仁玕把握到了關鍵的一點。

其次，一些同情太平天國的西方傳教士和政府官員在其國內宣傳太平天國運動時，也是着重強調後者的「反滿」色彩，而忽略其基督教信仰。西方社會本來就對太平天

曾國藩將太平天國運動稱為「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亦即把太平天國運動視為「文明衝突」；作者則認為理解太平天國運動最重要的角度是它的「反滿」訴求，太平天國運動作為一場「種族革命」的色彩更濃厚。

三 中外勢力聯合絞殺 太平天國？

國的基督教信仰存疑，在得知幹王洪仁玕也納妾之後，他們都表示了極度的失望。此外，西方報紙將清王朝的統治者稱為滿洲的「韃靼人」，而太平天國運動則是「一部分中國人揭竿而起，欲使國家擺脫異族統治」（頁64）。顯然，在他們的語境中，「中國人」就是漢族人。

作者關於太平軍「反滿」訴求的觀點還可以從其他方面得到印證，如作者並未提到、但卻是太平天國標誌性的象徵——髮型，即為一個重要的「反滿」標誌。太平軍被稱為「長毛」，因為參與太平天國的人都蓄長髮，放開辮子。這可以看作是對清廷的國策「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反抗，是太平天國典型的「反滿」訴求之一。此外，也有中國學者利用不同的材料，從不同的角度印證了作者這一觀點^⑥。

不過，我們還應看到作者在論述這一問題的過程中存在的缺陷：不管是太平天國的「反滿」口號還是曾國藩攻擊太平天國要「顛覆中國文明」，他們爭奪的很大一部分支持者主要是識字的漢族士大夫階層；而太平天國能吸引大批貧民、流民階層加入則有另外更深層、更複雜的原因有待探討，如太平天國特有的「軍事組織」^⑦、中國底層社會的流民文化^⑧，等等。所以，不管是「種族革命」還是「文明衝突」，都不能成為概括太平天國運動的一種模式。因為歷史事件的發生和發展都是複雜的，各種各樣的理論都只能給我們提供一個理解歷史的視角，萬不可將歷史事件單一化、概念化。

在中國大陸的革命史框架中，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被歸結為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作者則在本書中對此問題提出了另一種看法：雖然清廷（湘軍）和西方勢力（英法）在東西兩面進行同一場戰爭，卻是各自為政，各自都認為自己是左右大局的唯一力量，他們之間並沒有相互呼應，而只是在客觀上共同起到了消滅太平天國的作用。一方面，西方列強和清廷為了簽訂新條約剛進行了一場戰爭，清廷殺了列強的人質，英法聯軍則洗劫了圓明園作為報復，雙方存在着嚴重的互不信任；另一方面，曾國藩的湘軍部隊完全是靠他本人和背後的官僚、鄉紳勢力一手建立起來的，其間並沒有得到多少來自西方勢力的援助。他從「道學家」的角度出發，認為「洋人都是沒教養，不守規矩，不懂儒家的忠信之道」（頁350）。毫無疑問，雙方之間芥蒂很深。

關於這個問題，早已有中國學者進行過討論。茅家琦在關於「借師助剿」的文章中，就從清王朝的切身利益、歷史教訓和傳統觀念等三方面，分析了以咸豐帝為代表的清王朝統治者和官僚階層（包括曾國藩）為甚麼堅定反對借助西方之力剿滅太平軍這一舉措^⑩。在另一篇文章中，他還得出了「十九世紀整個五十年代，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並沒有和中國封建主義勢力勾結起來共同對付太平軍」^⑪的結論。

然而，情況也並不就是如此的「非黑即白」。雖說英法軍隊的作戰

在中國大陸的革命史框架中，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被歸結為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作者認為雖然清廷（湘軍）和西方勢力（英法）在東西兩面進行同一場戰爭，卻是各自為政，沒有相互呼應，而只是在客觀上共同起到了消滅太平天國的作用。

雖然清王朝的統治者（包括曾國藩）和西方列強在表面上都有不合作的理由，但是出於各自的利益考量，他們最終還是選擇了共同的目標——消滅太平天國。太平天國迅速走向失敗的原因在於同時受到了清廷和英國兩方的壓力。

範圍有沒有超過上海、寧波等口岸城市及其周邊地區，與清廷有無協同一致（特別是李鴻章的淮軍到達上海之後）進攻太平軍，還有待對史料的進一步挖掘，但是如華爾（Frederic T. Ward）、戈登（Charles G. Gordon）的「常勝軍」等僱傭軍部隊，確實是與當地的清軍相互配合，對在江南活動的太平軍造成了不小的麻煩。至於怎樣認識這些人的作用和歷史地位，作者認為英國的這種「代理人制度」，其實質就是要將英國直接介入清廷與太平天國之間的程度降到最低，因為這才符合其目標——恢復中國國內秩序和擴大通商，同時保持英國官方的「中立」立場（頁342）。

另外，作者在書中提到一些細節，看似是西方列強的一些無心插柳之舉，卻深刻改變了戰局。馳騁在長江上的西方汽船是當時重要的交通工具，當洪仁玕希望英法兩國能用這些汽船將太平軍的士兵運送到長江中上游以實現他的戰略設想時，卻被兩國拒絕了。而當曾國藩想開關他的「第二戰場」時，這些汽船卻將李鴻章的淮軍運送到了上海（頁294），從而使南京陷入了兩面受敵的困境。

所以，筆者認為，雖然清王朝的統治者（包括曾國藩）和西方列強在表面上都有不合作的理由，但是出於各自的利益考量，他們最終還是選擇了共同的目標——消滅太平天國。而從太平天國後期發展的形勢來看，儘管其內部存在着巨大的問題，但其迅速走向失敗，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同時受到了清廷和英國兩方的壓力。

四 「天國」的失敗還是「天朝」的失敗？

關於太平天國運動對清王朝的命運和中國歷史的影響，學界已有頗多論述^⑬，作者也未在這兩方面着墨太多，而是主要分析了太平天國失敗後，清王朝統治的延續對曾國藩的意義與對英國的影響。

對於曾國藩，當時和後來的人們都在討論一個問題：在消滅太平天國之後，曾國藩完全有能力推翻清王朝，繼而君臨天下^⑭，但他卻選擇了解散湘軍，做回一個普通的官僚。作者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真正的曾國藩是個「極恭敬、淡泊、常苦於抑鬱與前途渺茫之人」，「他或許懷疑朝廷官僚腐敗、貪婪、無能，但從未質疑皇帝本人的正當性」（頁385）。對他來說，攻入南京，消滅太平天國，首要的意義就是延續了清王朝的統治，保住了清王朝就保住了他心中的道統，保住了「那由高位、肯定、道德和學術成就組成的體系」（頁388）。作者從道德和政治理想的層面來理解曾國藩的行為，雖有一定的合理性，卻忽略了中國官僚政治鬥爭中的殘酷性和複雜性。

筆者認為曾國藩在這個功成名就的時候選擇急流勇退，絕不只是想留「千秋身後名」，更不是僅僅想保留住心中的道統，而是出於歷史和現實政治局勢考量的結果。在剛建立湘軍之時，地方官員對他的侮辱和掣肘仍歷歷在目；大功告成之時，朝中的「清流」又不斷向皇帝諫言要防範他。這些都讓他深知官場的險惡，不宜輕舉妄動。此外，

他也清楚知道，湘軍的鄉土意識濃厚，勝利之後不讓官兵衣錦還鄉，勢必造成軍心不穩。這些都是他最後解散湘軍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正是由於湘軍的特殊組成結構——層層效忠，軍隊的私人屬性極強，即使曾國藩下令解散湘軍，其湘軍部屬也早已牢牢掌控轄地的軍、政、財大權^⑤，清廷迫於形勢只得默認。這一局面直接導致了所謂的「督撫專權」、「地方割據化」^⑥，直至在義和團時期發生「東南互保」的事件。從王朝大一統的角度來看，清廷對地方的控制力十分虛弱，早已名存實亡。可以說，曾國藩及其門生故吏既消滅了太平天國，也間接地摧毀了清王朝的統治能力。

而對於英國來說，幫助清廷鎮壓太平天國也沒有得到其設想的好處。首先，雖然戰爭對江南地區的破壞使得處在英法保護中的上海空前繁榮起來，但是隨着戰爭的結束，人員和資本的流出使上海房地產市場迅速崩盤，航運業衰退，英國在華兩大商行都於此後破產（頁388-89）。其次，幫助清廷鎮壓太平天國沒有使英國和清朝的外交關係有所改善，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清廷與他們通商的態度。作者引用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的話指出，英國介入鎮壓太平天國是個大錯誤，阻斷了中國社會「一個正常、有益的自然過程」，而滿清滅亡「動盪將更為暴烈，而且會拖得更久，因為那被拖延太久，老早就該發生」（頁392）。回顧1911年清王朝統治終結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三十多年間，中國國家和社會秩序的恢復與重建，經歷了多少坎

坷，付出了多少代價，伊藤博文的這段話確實值得深思。

五 結語

筆者認為，評價一部學術著作首先要看其是否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有所創新。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者來說，《天國之秋》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和視角——以國際化視野來觀察近現代中國歷史——值得借鑒。自從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提出「衝擊—回應」的中國近代史敘述模式以來，中西方學界就一直在「我者」與「他者」的角色中苦苦掙扎，在各自的立場上討論問題。柯文(Paul A. Cohen)提出的「中國中心觀」，其內涵也大致屬於茅家琦所提的「就事論事」，在思考問題時不免讓人覺得矯枉過正。國際化視野則把所有的研究對象都看作是研究者之外的「他者」，以「冷眼旁觀」的姿態看待歷史事件中所有的思想交鋒、利益博弈。

當然，國際化視野或者世界史視野也不是本書作者的首創，柯偉林(William C. Kirby)最早在民國史研究的領域提倡要採用國際化的研究視角^⑦。在中國大陸學界，陳謙平也從史料的獲得、研究視野的拓展和觀念的轉變等多方面提倡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採用國際化的視野^⑧。而作者在寫作本書時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協助恢復中國十九世紀時在世界上應有的位置」（頁xxiii），在研究中擺脫近代中國「落後挨打」的研究預設。國際化或全球化遠不是一個只在當代進行的過程，中國早就被捲入其中。參

曾國藩及其湘軍既消滅了太平天國，也間接摧毀了清王朝的統治能力。對於英國來說，幫助清廷鎮壓太平天國沒有使英國和清朝的外交關係有所改善，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清廷與他們通商的態度。

作者寫作《天國之秋》的目標之一就是「協助恢復中國十九世紀時在世界上應有的位置」，在研究中擺脫近代中國「落後挨打」的研究預設。國際化或全球化遠不是一個只在當代進行的過程，中國早就被捲入其中。

照本書的敘述，可以說這一過程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的歷史進程。

其次，可讀性是作為一部優秀著作的前提，同時也是史學通俗化努力的關鍵之一。《天國之秋》兼具文筆優美、史料豐富、觀點清晰等優點。作者認為，普通讀者可以把本書當作以「衰落帝國為背景，講述良心和命運的一則道德故事」（頁xxi）來讀。通過作者的描述和引用各種資料，將這場清廷、太平天國與西方列強在戰亂中的野蠻、殺戮完全呈現了出來，讀者可以從中體味這個混亂的時代中各種人物在追求理想、求生和鬥爭中的抉擇。作者引用了英國作家格林（Graham Greene）《文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中的一句話來作為全書的結尾，更是引人遐思——「人遲早得選邊站，如果還想當人。」（頁395）這句話既為英法等列強在中國採取的各種行動做了很好的註解，也可以由此出發理解曾國藩征戰太平天國時期的心路歷程，還可以看成是「苟活於亂世」的普通人處在各種強權勢力之間的無奈。

最後，書中還有一些有待繼續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如作者提到，在龐大的攻打大沽炮台的英法遠征軍隊伍中，有一支多達三千人的運輸部隊，他們大多是來自廣州地區的客家人，社會地位低下，而且「他們對北方中國人沒有任何同情心」（頁105）。怎樣在中國近代以來「民族—國家」的歷史建構中去講述這些「合作者」的故事^⑨，怎樣去理解這些現象，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又如書中提到清廷命令曾國藩盡快拿下南京，但主攻南京的

曾國荃想要獨佔拿下南京的功勞，所以拒絕李鴻章的淮軍來合攻。曾國藩為此憂心忡忡，李鴻章看出了其中的因果，遂向清廷藉故推脫了攻打南京的任務，幫助曾國藩解除了來自清廷和曾國荃兩方的壓力（頁374）。由此可見李鴻章高超的政治技巧，而目前學術界對他前期政治生涯的研究還不夠深入^⑩。

總的來說，本書雖然有個別觀點值得商榷，但作者深刻的材料功底、新穎的研究思路和優美的文筆都使《天國之秋》堪稱近年來太平天國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值得作為太平天國史乃至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書。

註釋

- ① Stephen R. Platt,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此書另有台灣版，參見普拉特（Stephen R. Platt）著，黃中憲譯：《太平天國之秋》（台北：衛城出版，2013）。
- ② 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參見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全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茅家琦主編：《太平天國通史》，全三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Albert Feuerwerker, *Rebell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5)；Jonathan D. Spence,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 W. W. Norton, 1996)。
- ③ 郭廷以：〈太平天國的集權統治〉，載《近代中國的變局》（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109。

- ④ 〈紀念太平天國革命百周年〉，《人民日報》，1951年1月11日，第1版。
- ⑤ 茅家琦：〈放開視野，觀察歷史——就《太平天國史》的評價問題與呂實強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頁213。
- ⑥ 曾國藩：〈討粵匪檄〉，載《曾國藩全集·詩文》（長沙：嶽麓書社，1994），頁232。
- ⑦ 1996年羅友枝（Evelyn S. Rawski）發表的文章成為「新清史」研究出現的標誌（參見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no. 4 [1996]: 829-50）。其後這一領域又出現了多位有代表性的學者，如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歐立德（Mark C. Elliott）、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等。參見黨為：《美國新清史三十年——拒絕漢中心的中國史觀的興起與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中國清史學界對這一潮流也有回應，參見劉小萌：〈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2010年9月21日），近代中國研究網，<http://jds.cass.cn/Item/8536.aspx>。
- ⑧ 姜濤通過分析太平天國反滿的綱領性文件〈奉天討胡，檄布四方〉、攻佔南京後對滿族人的屠殺以及後期反滿政策的轉變等三方面對太平天國的「反滿」問題進行了探討。參見姜濤：〈關於太平天國的反滿問題〉，《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頁90-96。
- ⑨ 郭廷以：〈太平天國戰史〉，載《近代中國的變局》，頁126。
- ⑩ 參見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頁727-34。
- ⑪ 茅家琦：〈試析咸豐帝拒絕「借師助剿」的原因〉，載《晚清史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201-25。
- ⑫ 茅家琦：〈對19世紀50年代中外關係的一點看法——太平

天國失敗原因辨析〉，載《晚清史論》，頁250。

- ⑬ 參見孔飛力（Philip A. Kuhn）：〈太平軍叛亂的透視〉，載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5），頁342-44；崔之清、胡臣友：《洪秀全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322-50。
- ⑭ 羅爾綱的一個標誌性觀點認為，李秀成是學三國姜維詐降，引誘曾國藩稱帝，以圖恢復太平天國。而曾國藩手下之人也多想擁他為帝，由此可以看出曾國藩當時的處境。參見羅爾綱：〈李秀成傳〉，載《太平天國史》，第一冊，卷五十七，頁2017-64。
- ⑮ 參見魏光奇：〈清代後期中央集權財政體制的瓦解〉，《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頁207。
- ⑯ 參見朱東安：〈太平天國與咸同政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頁1。
- ⑰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中國的國際化：民國時代的對外關係〉，《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12月號，頁33-46。
- ⑱ 陳謙平：〈國際化發展——中華民國史研究的新視角〉，《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頁133。
- ⑲ 「合作者」的研究因為很容易被引入到「漢奸」等情緒化的話題，所以當下中國的學術研究一般都不大涉及，卜正民的新著研究了抗戰初期江南地區的「合作者」，或可為此類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參見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潘敏譯：《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 ⑳ 參見雷頤：《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歷史漩渦裏的重臣與帝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